

周而复 选集

现代皖籍名作家丛书

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选集

上海的早晨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4年合肥

责任编辑：徐子芳

封面设计：紫 燕

插 图：华三川

上 海 的 早 晨

第一卷第一部

周 而 复

•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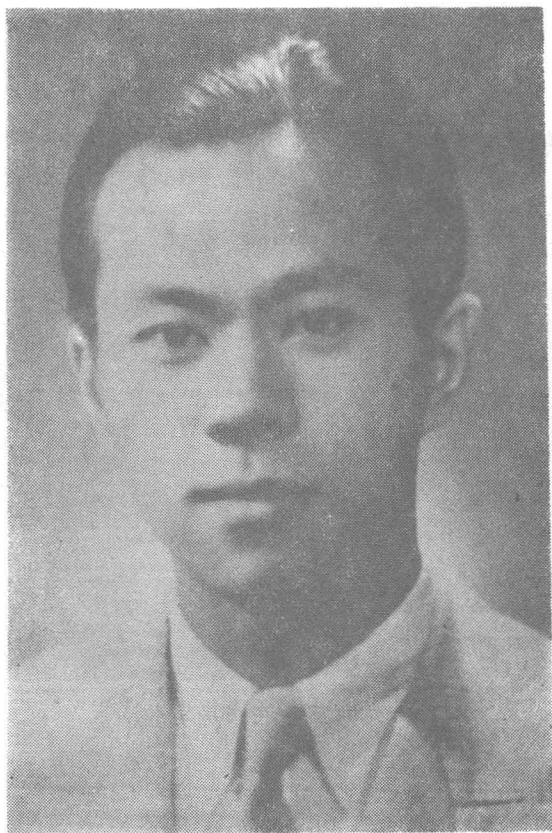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25 插页：4 字数：423,000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6,500

统一书号：10978·6 定价：2.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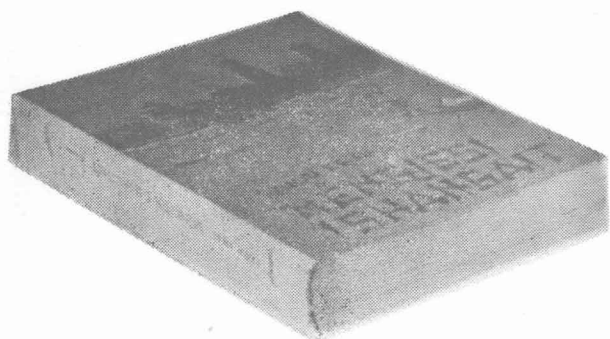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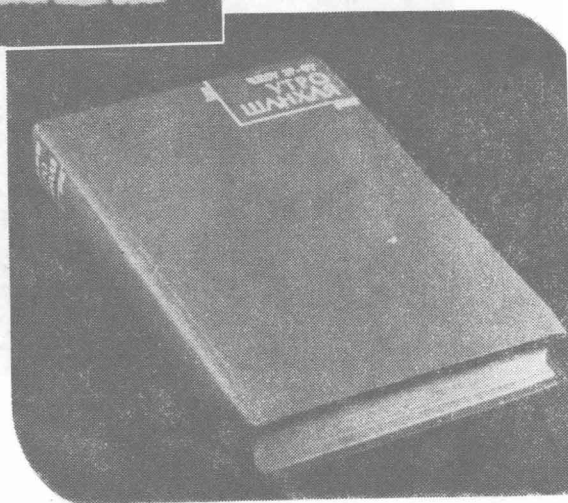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夏・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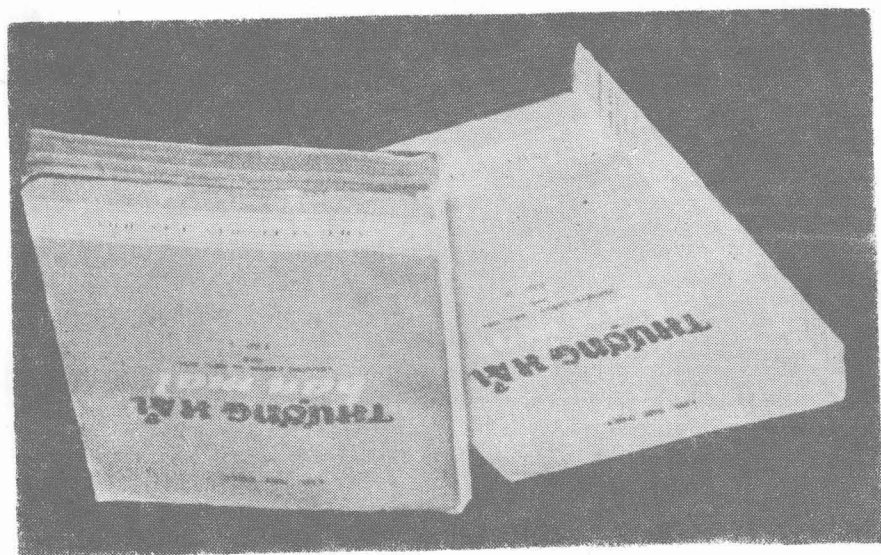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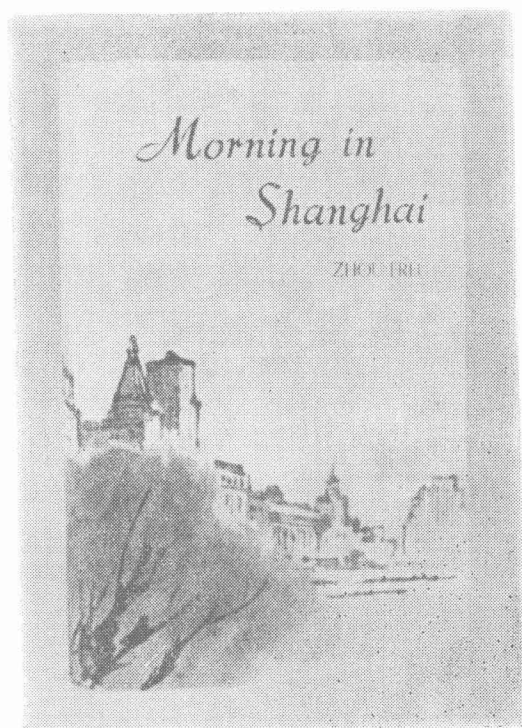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三年在书房写作



一九八二年六月。北京



《上海的早晨》
各种外文版本



莫有对厨片的客人都走？……古与甚间的毫
有也德？……与甚清溪溪的那间房向此毫灯能出
毫光看，但是客人也走的左右多？……只有冯永
样些板沙成土，翘起二郎腿，嘴角上叼着一支
香烟，抽得正起劲哩。唐竹管更冯永样些在讲
是也的动，和这火一会有事情要商量，陆洪
生在沙地上。与甚样是今天的事道主，冯永
样些唐竹管心走，也而好受样。……

冯永：再拿一私如排，急标？
“若样是王样管，少样是？取样样？”
那，唐竹管样是未说：“干院再拿一私由

……

……

……

周而复小传

周而复，原籍安徽省旌德县，一九一四年一月三日（即民国二年十二月八日，阴历）生于南京一个小职员家庭，幼年上私塾，读四书五经之类的书，十五岁上南京青年会中学，写过一些短文，在报刊上发表；一九三三年秋进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写作诗歌和小说。一九三六年，同田间等合编《文学丛报》，与欧阳山、张天翼、沙汀、艾芜等编辑《小说家》月刊，与鲁迅、茅盾、欧阳山、绂弩等发表文学工作者宣言。一九三八年夏，大学毕业后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学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参加编辑文学半月刊《文艺突击》；第二年秋到晋察冀边区，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从事部队文艺宣传工作。一九四二年冬回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写了记述伟大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高贵品质的报告文学《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和歌颂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短篇小说。一九四四年到重庆编辑中共机关杂志《群众》半月刊。抗战胜利后，以《新华日报》和新华社特派员身分，随周恩来同志等到东北、华北、华中等地采访，写了不少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内战阴谋的通讯报告。一九四六年到香港，主编《北方文丛》，同茅盾、适夷等合编《小说》月刊。这期间，不仅介绍了解放区的文艺创作，并且还创作了反映解放区人民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燕宿崖》、中篇小说《西流水的孩子们》。《白求恩大夫》塑造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的高大形象，受到

了读者的欢迎。一九四九年五月初，由香港到北平，不久，随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曾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宣传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协理事等职。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曾和郑振铎同志一起带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曾率领中国杂技艺术团访问阿根廷、巴西、乌拉圭、智利、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等国家；一九五九年作为中国代表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全国文化工作大会；一九六一年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在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争取经济解放与和平的大会，会后曾访问墨西哥和古巴；一九六三年代表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出席在日本京都举行的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年会，会后并访问日本。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一年参加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问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约旦、叙利亚、突尼斯、澳大利亚、新西兰，顺访巴黎和联邦德国。一九八二年至八三年，率领作家代表团访问意大利，率领中国书法家代表团访问日本，率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芬兰、挪威、瑞典、冰岛、丹麦等国。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先后出版了反映党和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第一部至第四部，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

他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第十三粒子弹》、《春荒》、《高原短曲》、《山谷里的春天》等；散文集《歼灭》、《怀念集》以及访问亚洲的散文集《东南亚散记》、访问欧洲、美

洲、西亚和大洋洲散文集《火炬》、《掠影集》；剧本《牛永贵挂彩》、《子弟兵》等；诗集《夜行集》；报告文学集《晋察冀行》、《东北横断面》、《松花江上的风云》；论文集《新的起点》、《文学的探索》；杂文集《北望楼杂文》等。作品译成外文的有《上海的早晨》（日文、英文、俄文、阿尔巴尼亚文、越南文），《燕宿崖》（日文，改名《八路军》）、《白求恩大夫》（日文、英文、俄文），《西流水的孩子们》（俄文）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写了热情歌颂敬爱周总理的长篇叙事诗《巍巍的丰碑》，开始发表其中部分章节。他曾任五届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现任文化部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他是全国五届和六届政协委员。

序

—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组织上分配我到即将解放的上海工作，我曾经提出要求到新闻部门工作，当一名新闻记者。我希望采访上海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因为三十年代，我在上海一所私立大学读过书，工作过一段时间；四十年代后期，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也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可以说对上海多少有些了解，也对上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希望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能写一部描写上海工人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以反映上海的变化，而上海是中国的缩影，既可以看到她的过去，也可以展望她的未来。我的要求没有批准，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工作。

我们一批南下干部乘了一列专车(当时北平和南京还没有正式通车，上海尚待解放)，到了南京，好客的主人虽然挽留我们多在南京停留几天，但我们这批干部要随大军解放上海，希望早日投入上海解放后的繁忙工作。这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都住在丹阳。我们赶到丹阳的时候，第三野战军已经包围了上海，国民党反动军队成了瓮中之鳖，只等中央一声令下，随时就可以解放上海。华东局正在进行接管上海的

准备工作，首先要配备和训练接管干部。我向华东局报到以后，组织上立即找我谈话，分配我到即将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

上海完全解放前夕，我随华东局负责同志邓小平等一同进入上海，第一天住在圣约翰大学，以后华东局负责同志便住在瑞金路国民党励志社旧址办公。上海解放不久，华东局决定成立统战部，陈毅市长兼任部长。有一天下午，陈毅同志约我到市长办公室谈话，准备派我到华东局统战部工作，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正在考虑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时，陈毅同志又说下去，他知道我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上海呆过，认为我在统战部工作很合适；并且谈革命工作和文艺工作的关系，参加实际工作对文艺创作也有好处等等。他仿佛洞察我脑海里考虑的问题，不等我说出来，就主动给我解决思想上的问题。我个人不过是革命机器上的一个小小螺丝钉，这个小小的螺丝钉只要能起一点微小的作用，放在革命机器的哪一部分都可以。

我到华东局统战部工作，别说写文学作品了，就是看文学作品的时间也很少了，整天忙于统战部工作，经常接触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上海地方负责人以及各界爱国人士。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遭受美制国民党反动派飞机轰炸，上海电力发生严重困难，加上原料来源减少，私营厂生产发生困难，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私营厂渡过了难关，我也参与其事；为了调解劳资关系，我同工会、劳动局和工人和资本家有过接触；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亲自过问了几个严重的典型案件，倾听和组织被迫害者家属血泪的控诉，依法宣布凶手的死刑；开展五反运动，作为“五反工作队”的一个成员，我曾经参加一个私营纺织厂五反运动整个过程的工作；以后，又参加少数工厂和商店“五

反”工作。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和较大的私营厂商负责人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为，一共三百零三家厂商和工商界代表人物，简称303户，我从头至尾参加这一工作；私营工厂进行民主改革，我也到几个私营厂工作，并且调查研究民主改革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等，我做为统战部干部，更是份内的工作。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则是在上海解放以后，统战部和有关部门在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就着手逐步进行的。

为了工作上的需要，要和上海各阶层人士打交道，了解情况，研究和解决问题。接触次数多了，了解的深了，渐渐成了朋友，一些私营厂的工会干部和工人常常是我家中的座上客，他们召开厂党委会或者是工会会议和生产会议，我去了，随时都可以列席参加。他们节假日有什么活动，有时也邀请我参加，见了面，无话不谈，从厂里的生产到他们家庭的琐事。如果隔了一段时间没有到厂里去，一见面，他们就把这一段时间厂里发生的事情以及张家长李家短的情况一一告诉我。

我在统战部所接触的人和事当中，当时只是想怎样处理问题办好事情。在工作中，我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工人群众的脉搏一道跳动，分担他们工作中遭遇挫折的忧虑，也共享胜利的喜悦。当时我参加这些工作必须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把事办好，一心只想完成任务，也就是说，我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当事人，任务能否完成，负有直接的责任。这时，我一心只想把工作做好，而没有想到文学创作。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曾经想写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从解放初期我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到五反运动在上海展开，

特别是直接参加303户的“五反”工作，我的想法有了改变。全国解放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所有制的改变，即将资产阶级私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也就是公有制，是最根本的变化。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所有制，而代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我要反映这个基本矛盾和所有制的变化，这是上海的根本变化。

二

一九五二年春，我开始构思反映这一基本矛盾的长篇小说，即《上海的早晨》。统战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纷至沓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我把这些素材一一记了下来，写了比较详细的写作提纲，不断修改。曾经设想写六部，后来我放弃了这个计划，只写四部：第一部写民族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第二部写打退民族资产阶级进攻，开展五反运动；第三部写民主改革；第四部写公私合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走上国家

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逐步过渡到公有制，消灭私有制。

工人阶级在一个国家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就是说如何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除了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外，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来改变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且认为能这样做，对无产阶级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指出：“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苏联革命成功以后，列宁曾企图用赎买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当时国内国外的条件，没有能够实现，不得不采取没收的办法。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采取列宁曾想实行而没有能够实行的赎买政策，用和平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从而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在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成功地实行和平的赎买的政策解决了这个问题，树立了典范，为今后工人阶级在其他国家取得政权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

全国解放以后，当时我国经济十分落后，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和他的主子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上海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资产净值是十四亿多人民币。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